

錢穆

講

中國經濟史

葉龍 編錄

聽國學大師講述中國歷代經濟問題



錢穆講
中國經濟史

葉龍
編錄

錢穆講中國經濟史

編 錄：葉 龍

責任編輯：張宇程

封面插圖：陳少烽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
© 201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08 7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序 一

胡詠超

吾友葉龍兄既刊行其《歷代人物經濟故事》(第一集)，復出其所編著之《中國經濟史》付梓。是篇原為錢賓四先生 50 年代於桂林街新亞書院講授“中國經濟史”與“中國社會經濟史”之筆記。賓四先生著作等身，其史學造詣，早蜚聲海內。方民初更始，西學橫流，先生講學上庠，傳統是揚，挽狂瀾於既倒，意量亦偉矣。獨惜於中國經濟史尚付闕如，使向慕先生之史學者，不無怏怏。今葉子滙集所記，編整成書，誠快事也。而先生之講授該兩科也，又不限於經濟一隅，觸類旁通，實可溝貫先生史學之全體大用焉。願茲篇傳之海內，為先生增一專著也。

1996 年夏歲次丙子胡詠超序於香港屯門嶺南學院

胡詠超先生於新亞文史系與新亞研究所畢業，獲中大碩士學位。曾任教於嶺南書院直至嶺南大學文史系，自講師至副教授前後逾 30 年。

序 二

梁天錫

中國歷代從政者，“皆據古鑑今，以立時治”。蓋以史為鑑，可以明得失。自古聖賢孜孜不倦，終身治經史者，欲其學有成，致用於當世也。先師錢賓四(穆)，終身鑽研國學。其門下弟子或時人，得其一言一語，或一字一詞者，世世享用不盡。1933年，先師於北大任“中國通史”講席；1954年及1955年，於香港新亞書院先後開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課程。余生也晚，皆無緣承訓。幸其通史有“國史大綱”傳世；其經濟史則自來未見刊行。葉龍學兄早余從侍先師數載，遂有幸並聆兩載之經濟社會史課程，並詳為筆錄。葉兄欲先師之學得以傳世，自1991年8月，迄1993年1月，兩年半間，精心整理、補釋兩科經濟史講稿，以流暢易讀之文筆書之，逐日刊於《信報》。茲為廣流傳，滙為一集，名曰《中國經濟史》。

是書循中國朝代先後論述。漢迄唐一段，最為詳盡，特重吾國財經制度之得失。中國以農立國，故述秦以前經濟，標榜周祖后稷，教民耕種；介紹黍、稷、稻、麥、菽、粟諸農作物。繼載井田制之爭議、興起、變遷與破壞，與夫税法、工商業、貨幣、私產及水利。

“中國自秦以來2000年之政治、學術，莫不與其社會形態相協應”。“自秦而下經濟地域逐次擴大”。秦漢社會經濟，重視土地、農業與農民。至若戶口之管理、手工業及水陸交通之發展，亦頗著成效。秦代開國，經濟已具規模：建立土地私有制，並重視農業。城市湧現，度量衡統一。貨幣流通，“工商發展，已有可觀”。惜苛捐重役，秦遂以亡。

漢初屢改幣制，高祖輕商重農，“輕徭薄賦”。制定役法、算賦、田賦、田租、租稅、封君諸制，“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政經穩定。漢武以

後，經濟思想發達，晁錯、賈誼、董仲舒主張統制經濟、限田政策，與司馬遷自由個人主義經濟思想爭議不息。古者煮海為鹽，冶鐵致富。武帝以鹽、鐵、酒專賣。行均輸、平準之制，富國而不利民。又行鬻爵、告緡、屯田之制，廣增國用。幣制自亂反正，以“節制資本”。皇室與政府，財政分治。惜用度過大，後宮妃嬪，高俸厚給，又大興禮樂，營造昇平，濫用國庫。王莽篡漢，“大事改革，田畝盡歸國有”，禁買賣田宅，復井田，更幣制。以六筭法制工商；行五均法增賦稅。然行之太驟，遂促其亡。光武中興，土地兼併之風盛，頒度田制以抑豪民，惜不果行，莊園制遂興，豪戶多畜奴婢。仍行田租、鬻爵及鹽鐵專賣之制。雖軍費、官俸、交通、賑災、水利、教育之費頗巨，然屯田之制，亦著成效，故鹽鐵專賣，至和帝而止。東漢手工業興盛，遼東、河西畜牧業亦盛。光武初復五銖錢制，至獻帝時更為小錢。此外，兩漢黃金存量極豐，植林、絲織、冶鐵、造船、陶瓷、釀酒、製糖諸業並盛，其輕徭薄賦，節制資本之功歟？

三國魏晉南北朝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化期。土地制之轉變尤甚。屯田自東漢末發展至晉，變成占田與課田。北朝則全力推行屯田與均田。土地而外，莊園、礦冶、鑄錢及工商業亦漸上軌道。曹魏屯田，強兵足食；鄧艾攻蜀，先灌良田；蜀漢屯田，以攻為守；孫吳屯田，民無饑歲。本書詳釋晉之戶調、品官占田、軍屯、賦役、雜稅、工業、商業、幣制、商稅及寺院經濟諸項目。南北朝之工業，採礦、鑄造、製瓷、紡織，以至鹽法亦在討論之列。又分述宋、齊、梁之賦役、陳之屯田，北齊、北魏、西魏及北周之租調、賦役及均田制，與夫五胡十六國之賦役、冶鐵工業；並總論北朝經濟制度，優於南朝。

綜上所述，為余所理解葉兄編撰、補充先師“中國經濟史”等之內容。經濟史非余所長，苟有未當，是讀之未審，思之不精，非原錄之失也。1964年3月、4月及6月，先師先後於香港新亞書院三度演講《論語新解》，其認同及重視語錄式《論語》傳世價值可見也。時余雖有幸恭聆“新解”，愧未筆錄。葉兄獨能筆錄、補充並出版先師之“中國經濟史”等講稿。是篇以流暢之語體

文寫成，深入淺出，士庶可讀。若人手執一冊，則可明瞭中國歷代經濟制度之得失，擇其善者應用於今日之工商社會、金融中心矣。妄申是序，敬祈賜諒。

1996年4月梁天錫序於香港能仁研究所

梁天錫博士於香港珠海書院歷史系畢業，新亞研究所獲碩士後，返珠海研究所深造，考獲台北教育部頒授博士學位。曾任珠海書院教授、能仁書院教授兼教務長、文史系主任、文史研究所所長。著述宋史多種，逾200萬字。

自序

葉龍

我在50年代中期就讀新亞書院時，業師錢穆賓四先生掌管校務之餘，每年總會開兩、三門課。當年我同黃開華兄、張乘風兄、顏錫恭兄等四五位同學來到九龍桂林街設校的新亞書院就讀，就是仰慕這位國學大師的學問。我是浙江人，能完全聽懂賓四師的無錫國語。賓四師講的課程，我都用心的作了筆記。其中“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文學史”及“中國通史”等，30多年來，由於寶愛這些學術性的筆記，所以一直還保留着。閒時常有翻閱。

賓四師82歲前視力尚佳的時候，我曾先後從賓四師講的課程筆記中，前後分十多次將其中摘錄出的100多條筆記用航空信寄給賓四師批改，集成相當數量的“講學粹語”，希望可以出單行本。賓四師總是很熱心的將我所整理的改正後寄還。賓四師逝世後，遂把這《講學粹語》寄給梅新先生在《中央日報·長河》副刊刊出，作為對賓四師的紀念。這一條條的粹語是賓四師平時上課或講演時偶發的，是他心中所蓄積的，在他的著作中也沒有提及過。

錢師母胡美琦女士在〈錢穆先生最後的心聲〉一文中的“後記”中引述賓四師的話說：“學術思想豈能以文字長短來評價，又豈可求得人人能懂、個個贊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寫一本書來說明，他還是不會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話，也可啟發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發明，已屬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後來者之繼續努力。我自信將來必有知我者，待他來再為我闡發吧！”（見1990年9月26日台北《聯合報·聯副》“送別一代大師紀念專輯”。）

台北《中央日報》副刊按日刊出賓四師的“講學粹語”後，讀到的友人見面談及，反應頗佳。這對好學の後輩們可以增長見識，有所啟發。因此引起

我整理賓四師所講的“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念頭。賓四師開這門課，上講堂時攜帶了筆記卡片，是作了有系統的備課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因此我整理了上古之部的六七篇，每篇 1000 字左右，寄給《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林先生除了精研當代中西經濟外，對於中國古代經濟也是極為重視。我們只要看他在《信報》寫的《政經短評》（編者按：該專欄刊至 1996 年底），常見他引用中國古代典籍中論及經濟的警句，來闡述或印證當前的經濟現象。林先生很快回信，認為有意在《信報》發表，只要尚未在其他報刊發表過的話。於是在 1991 年 8 月 14 日開始，這個《中國經濟史》專欄排日在《信報》經濟版刊出。當時《信報》經評版逢星期二至六，每週刊出五天。

刊出最先幾篇後，我因在台北度假，斷了稿，回港後見到《信報》編輯張曼麗姑娘的來信，談到“此稿刊出後，各界反應頗佳（按：由於斷稿的幾天裏，有讀者催稿），希望陸續賜稿，保持聯繫”等語。刊出期間，有中學教師的讀者來信要求我補寄他漏買的其中某一段《中國經濟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學見面時，其中不少是在中學擔任行政或執教文史的，他們提議我將來最好出專書；有一次我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看書，影印機旁看見一位同學正在影印《信報》的經評版文章，我問他比較喜歡哪些文章，他說，凡是有關中西古今的經濟文章，他都收集，心想：這篇中國古典經濟史還有青年人青睞，心中頗覺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見正在台北政大經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鄧辛未兄，他說他的學術單位中，個人或團體訂閱的《信報》就有 20 多份，也很注意我的專欄。最近自溫哥華回港的黎國豪兄，他說溫市也出版《信報》，很高興讀到我的專欄。有一次遇見饒師宗頤選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報》的這個專欄，要我結集出版時送他一本。饒師曾考評我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桐城派文學史》，評道：“論方苞、姚鼐文論要點出於戴名世，具見讀戴氏書，用心細而能深入。糾正時賢淺稚之論，尤有裨於學術界”。選堂師對我的鼓勵，使我衷心感激。

還有一位香港企業家維多利亞洋行東主徐家棠先生，曾多次來信詢問我何時出版專書，亟欲斥資購買。直至刊完全文後的一年多後，徐先生又來信

索書，函中對此文稿多有好評，可說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業界的一位知音，我只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贈，作為對知音的答謝。（按：《中國經濟史》最後一篇“中國的水利問題”則早於1991年刊登於《信報月刊》8月號。）

值得欣慰的，藉着《信報》刊登這個專欄，使我多年未見的老友由《信報》的轉信恢復了聯繫，也因此結織了愛護這個專欄的讀者朋友們。

記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時期，我曾做過幾件為賓四師整理講演稿的事。一件是當時“孟氏教育基金會”（按：此會為今日九龍界限街中山圖書館的創辦者），請賓四師主講“中國歷史研究法”，共分八講，每次兩小時。當時新亞書院的秘書徐福均先生要我擔任記錄。我整理好記錄稿謄正後，經賓四師修改潤飾，此書出版後，賓四師在該書序中還提及我做記錄的事。

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賓四師從50年代至60年代初歷年所作的講演，包括校慶、畢業典禮、孔聖誕、元旦及國慶等慶典會上所作的講演，包括由我記錄及當時亦常作記錄的楊遠、宋敘五、王兆麟諸兄所筆錄的，刊載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幾十篇是我投寄到《華僑日報》教育版或《星島日報》上刊出的，當時我只作新聞稿報道，並沒有具名，也無領取稿費。我搜集了這些賓四師的講演稿後，請字體寫得比較端正的多位中學同學謄抄，共有三百多張原稿紙，裝釘成厚厚的兩大本，我自己題了封面寫了序，記得賓四師那時住在鑽石山的西南台，我將這冊唯一的謄正講演抄本送給賓四師看時，他翻閱目錄後，也看了那篇序，然後說：“你這篇序倒寫得比前好。”接着他捧着這稿本進他的書房中去了，賓四師那喜悅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這一整理工作，心中頗為高興。

大概在70年代或稍後，賓四師定居台北素書樓時期出版了一本新亞書院時期的演講集，書名是《新亞遺鐸》，我早年送給賓四師那本手抄講演集，其中有幾篇賓四師的講演稿都是我自發自動作了筆記投寄到報社發表的，並無其他的校方記錄。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真太鹵莽，那些發出去的講演稿事先竟沒有讓賓四師過目，不然，他一定樂意肯為我修改才寄出的，幸而當時沒有出甚麼亂子，但總是一個過失。

賓四師還有多次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主辦的學術講座作專題講演的。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講“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

另一回是1961年11月8日起，每周一次，賓四師主講四次，共計五講，(第四、五講一次講完)，講題為“魏晉南北朝文化講座”以上講座，均由我隨往紀錄。我將紀錄稿謄正後呈師改削增刪，最後一講賓四師另行加寫五頁原稿紙加入，其中一頁一字不改外，其他四頁亦多增添改削，此稿我仍保留，彌足珍貴。但不知講稿有否出版，實乃值得出一專書。賓四師發表撰著他的學術思想向來是極為謹慎的。這從我替他老人家記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其他的多次講演，整理謄正後請他修改時，他總是極為仔細地作了修改，甚至我寄給他的“講學粹語”，他也仔細地改正，有時甚至整條刪去，一字不改整條保留的亦只有25條，只增減一、二字的亦有多條。

整理學者的講稿，其困難處比翻譯他人著作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筆記得完全正確固然難，要做到信、達、雅這三個標準則難上加難了。

此書之能結集出版，首先要感謝《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能讓我在1991年的8月直至1993年的1月，接近兩年在《信報》的經濟評論版上刊載完畢，也感謝《信報》總編輯沈鑒治先生及經評版的編輯先生與排印校對諸同寅；也感謝壹出版的周淑屏小姐及該社諸同寅，使此書得以順利出版，尚祈讀者諸君惠賜寶貴意見，不吝指正。

新版自序

人生的際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亞畢業逾 40 年素未謀面的老校友，本來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沒機會相識的了。有歷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畢業的，1967 年在歷史系重讀學位。夏仁山學長是重讀中文系學位的。自 1961 年起我與王兆麟兄同時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國文的兼任講師，不料在 1968 年遭遇被裁員的噩運。此後兆麟兄得到錢師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薦去了聖保羅中學，我則在新亞附近的聖母院書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時放學，便匆忙趕到新亞上課，選修了全漢昇、李定一、陳荊和、劉偉民等名師的課程。由於時間緊迫，根本沒法與同學們傾談。所以當時同讀歷史系的陸、黃諸兄，壓根兒無法認識。

直到 41 年後的 2010 年，意想不到的奇遇發生了。接到我曾擔任文學審評員多年的藝術發展局邀請參加酒會，並允許可偕同一位親友參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會中他認識的新朋舊友極多，因此使我認識了歷史系的黃浩潮學兄。次年藝發局又來函邀請，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認識了葉永生和陸國樂學兄。黃、葉兩兄多年前已從政府教育、司法機構高職退休，至今仍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陸兄則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後，復受陳萬雄先生禮聘擔任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說實在的，如果不是在酒會中有仁山兄介紹相識，即使在酒會中與上述諸學兄擦身而過，還是不會相識的。

這個世界上，老師中有良師，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幾位良師益友的。60 年來，自我完成新亞哲學教育系學業以來，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亞已遇到很多良師益友。良師中使我最欽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錢穆賓四師。當年(1953 年)我與李杜、張乘風、顏錫恭、吳業昭等畢業協同聖經學院後，為了要親炙這位大師而來報考新亞的。同學也

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經作古，而仁山兄可說直到如今仍是最相知的益友。新亞四年大專生活，他帶我去涂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稱呼涂伯伯涂伯母，因他們的長女是我們學姊。涂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涂府吃喝玩樂，使我這位獨在異鄉的異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溫暖。

70年代，仁山兄把我這位連考兩年中大教育學院的備取生變成正取入讀（因有一正取生棄讀讓我補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結識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對仁山兄說：“你退休後還這麼忙，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現在仁山兄又使我認識了多位鴻儒，當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

說真的，我們這班老校友都很懷念艱苦創辦新亞的錢穆老師，我們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談起這位終身為中華學術不懈鑽研而卓有貢獻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時，在錢師擔任院長兼所長及教授達12年後，他老人家竟突然宣佈要辭職。後來幸得經濟系主任張丕介師的堅決挽留作罷。但到翌年1963年時，他堅持辭職，而且不願以退休名義離校。如果當時有校友們同學們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會有轉圜餘地也說不定。（按：10月5日見到雷競璇校友在《信報》專欄寫的“錢穆在新亞”一文中說：“錢穆信函說‘在新亞真如一大惡夢’，此話極重，也極堪玩味，他說的惡夢是‘新亞’，不是中文大學。…人性中有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的弱點，錢穆辭職時，和他一起創立新亞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沒有誰離去。未知是否反映內部不一致…”。）

賓四師辭職後，他仍居港一段時間，我去拜訪他幾次，他從不向後輩訴說心事或閒談他人。某次談及我本身時，他才講了幾句。後來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談起過。賓四師的好友羅忼烈師在其〈緬懷錢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談到一些。但不論如何，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名人學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們對發揚中國學術文化的卓越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賓四師亦然。賓四師愛護新亞的心也是永恒不變的。賓四師辭職後，南洋各大學爭相禮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長的，他選了一間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後於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張曉峰先生請他擔任文化大學研究所

的教授，直至 92 歲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大多教了 25 年之久。

如果，錢師留在新亞教下去，一直教到 92 歲，那我們新亞數以千計的同學都可親近這位不世出的大師，豈不是新亞校友之福？可能有人會說，錢師在新亞辭職那年已是 69 高齡了，怎麼還可以教到 92 歲？普通一位教授當然年屆 60 或 65 歲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師級的教授是全世界都備受尊重的，例如我們新亞首屆校友余英時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國知名大學還仍爭相聘請他為講座教授；又如多間知名大學爭着禮聘他擔任客座榮譽教授的饒宗頤選堂師，今歲年屆 95 高壽。杭州西冷印社還禮聘他為德高望重的社長。名師是不受年齡限制的，如果錢師 80、90 歲時還在新亞的話，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週只請他講學一次也做得到。這對我們新亞今後得以親近名師的數以千計學弟學妹們，真是何等大的福氣。

錢師從來不為自己的名利着想，他曾親口對我說：“兩萬港元與一萬港元的月薪是沒有分別的。”他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置產，直到他病逝那年，現在仍在台北監獄服刑的陳水扁，當年要錢師遷出素書樓，錢師母為了爭口氣，在市區買下一間屋，房價付不起，還是一位書商捱義氣，多付出一筆版稅才能成交。這是一位出版家告訴我的。

錢師主持新亞校政的十幾年裡，先是住在九龍桂林街和嘉林邊道的學校宿舍，後來租住鑽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風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後，文大與故宮博物院給他的研究費每個月都是一萬元台幣而已。可是錢師牽掛着新亞的心卻是永遠的。記得錢師自台北來新亞參加 35 週年校慶，筵席上林院長誠邀他 40 週年慶時再來。我有幸坐近錢師旁（只隔兩個座位），只聽錢師低聲回應着：“那時我可能不能來了，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話，我是會回來的。”聽了使人心感淒酸，但老師愛新亞之心溢於言表。現在老師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師還留下豐碩的寶貴著作，讓我們後輩研讀學習，老師的學術思想將永垂不朽。錢師在經、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儻論和卓越見解，我們後輩當謹記勤習，使中華學術文化日益發揚光大。

過去數月來，與上述諸學兄茶聚中，當我提起想把錢師的“講學粹語”出版時，學兄們均表贊同。於是浩瀚學兄要我把這些擬出版的資料盡快交給國樂學兄評閱。包括錢師的手札以及講學粹語和多篇對錢師生平的報道，連我曾在《信報》刊載過的“歷代人物經濟故事”和錢師講述的“中國經濟史”兩個專欄作品也一併送審，國樂學兄又請毛永波先生一起來研商何者可先出版。憑永波先生的卓識和銳利目光，認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國經濟史》，已缺售十餘年，但該社已不出版學術書籍。因此錢師《中國經濟史》之得能重見天日，實在衷心感謝國樂學兄之重視及永波先生之識見。也要感謝編輯經驗豐富的張宇程先生。他將錢師講述的中國經濟史，準確編排了朝代，訂正了在報章作專欄刊出時的一些疏誤，成為一冊相當完美的學術與知識兼重的歷史書籍。也感謝尚學中心的王龍生兄，為此書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

最後，希望愛護本書的讀者不吝提出寶貴的意見。

葉龍於香港、九龍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葉龍博士自 1953 年畢業於協同聖經學院後，以同等學歷入讀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繼而考入新亞研究所，由錢賓四師指導，主修中國哲學，得碩士學位。繼而一面教學，一面兼讀學位，計獲中文大學乙級榮譽學士學位(主修歷史)及教育文憑(主修中文)，後又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均主修中國文學)。

葉君曾執教於香港大、中、小學各七間。歷任教師、講師、主任、教授及校長，計共 45 載。所教小學有至正、竹慶、沙螺洞、崇正、新會、信義及聖十架等校；中學有協同、李賢堯、劉金龍、聖母院、嶺東、培中及能仁等校；大專有東南、廣才、華僑、遠東、中大新亞、嶺南及能仁(含兩研究所)等校。服務較久者計有協同、劉金龍各四年；李賢堯任中文或中史科主任共 12 年，直至退休；繼又受聘任私立能仁書院院長兼文史、哲學兩研究所所長達九年。葉君服務於新亞亦為時頗長，計任中文系兼任講師達七年，並任新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達六年，其間由錢賓四師指導，研究唐宋及桐城古文。

主要著作有《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孟荀教育思想比較》、《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王安石詩研究》、《中國歷代人物經濟故事》及《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以及參加兩岸三地國際研討會論文數十篇。至於錢賓四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亦由葉君筆錄。



錢穆先生 1956 年出席新亞書院九龍農圃道校舍奠基典禮時在台上致詞。



錢穆院長（右）時兼任新亞研究所所長，於 1959 年 7 月向葉龍頒發碩士學位文憑。